

当代经济思想

—若干专论

〔美〕西德尼·温特劳布 主编

商务印书馆

当代经济思想

——若干专论

〔美〕西德尼·温特劳布 主编

陈 玮 张廷玉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89 年 · 北京

Sidney Weintraub
MODERN ECONOMIC THOUGHT

B. Blackwell Ltd. Oxford 1977

本书根据牛津 B. 布莱克韦尔公司 1977 年版译出

DĀNGDÀI JINGJÍ SÍXIǎNG

当代经济思想

——若干专论

【美】西德尼·温特劳布 主编

陈 玮 张廷玉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三河县二百户印刷厂印装

ISBN 7-100-00094-X/F·17

1989 年 8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9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84 千

印数 1.5 00 册

印张 4 3/4

定价: 1.85 元

/

出版说明

本书原名《当代经济思想》，是一本比较全面地介绍当代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综合性的读物。作者们追溯了本世纪以来经济学上的重大发展——从马歇尔的新古典学派到后凯恩斯学派的种种理论，同时对理论的各种分析趋向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评述。其中包括对凯恩斯主义、均衡理论、微观经济学、货币理论、经济增长和分配理论等专题的系统介绍，内容比较丰富。由于书中很大一部分内容我们已经出版了原著的中译本，有关部分不再译出，而只选译该书的最后一部分——“若干专论”，所以书名改为《当代经济思想——若干专论》。

我们节选的这一部分对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作了广泛的评估，其中包括：对福利经济学三个阶段的基本原理的评述；对意识形态输入经济学的程度的探索；对人口经济学和远景经济学的研究；关于技术进步同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的调查；对国际经济学重大发展的评论以及对发展经济学和激进经济学的讨论等。

本书由十位专家集体编写，选材精当，阐述明晰。本书主编西德尼·温特劳布长期从事教学工作，经验丰富，熟悉各种文献资料。

本书所选译的部分为原书的第二十二章至二十八章，中译本改为第一章至第七章。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福利经济学: 或, 在什么时候变革就是改善?	
..... 摩根·雷诺兹和尤金·斯莫伦斯基	(7)
第二章 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	 沃伦·萨缪尔斯 (30)
第三章 人口: 长期经济学	 理查德·A. 伊斯特林 (51)
第四章 技术: 所费少而所得多吗?	 莫顿·I. 卡迈因
..... 南希·L. 什瓦兹	(68)
第五章 国际经济学的发展	 阿瑟·I. 布卢姆菲尔德
..... 威尔弗雷德·埃西尔	(85)
第六章 发展经济学	 杰里·R. 贝尔曼 (107)
第七章 激进经济学	 艾琳·阿佩尔鲍姆 (130)

导 言

要是把分类的逻辑加以引伸，这最后一组论文中有不少篇本可以分别归属先前的各组。人口、技术、发展完全可包容在增长这个大题目之下。不过，它们的旨趣不尽相同。而福利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激进经济学也满可以纳入均衡体系——从而形成一个奇特的共同体。但编者并没有这样做，还是把这些文章集中起来另立专章，以使读者对现代经济学有一个尽量全面而完整的了解。

斯莫伦斯基教授和雷诺兹教授是研究帕累托最优化的，在讲授时往往把它跟福利经济学混同起来，认为价格法规最适用于静态经济，而不是实际经济。更经常的是，只假定有关费用是一组纯客观的可数量，为图简便而有意忽略重要的主观（即使用者费用）成分，因为这种主观成分会使福利经济学的具体应用复杂化。此外，令人伤脑筋的市场故障并发症会引起可疑的“次最优”——也是低阶的——权宜解决办法。

投资、收益和事务费用在变化着的条件下的时间间隔促进了旨在评价政府支出的福利效应的“费用——效益”分析。诚然，这早就是一个有待于赋予现代名称的古老概念。哲学家（以边沁的功利主义最为突出）、政治理论家、法理学家以及议员们一直在对伴随公众行为的优点而来的缺陷权衡其得失。现代经济学家则用数学手段把这一概念精雕细刻，以避免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不幸的是，大多数“效益”和许多费用都是未来的和分散的，由于实际情况难于预测，计算自然也就无法精确。

在我看来，萨缪尔斯教授（W. J. Samuels）承担了一项最难捉摸的任务——限制意识形态的朦胧概念在经济学中泛滥。它的

普遍存在影响了经济学的所有分支学科：看来经济学家命定要在这种矛盾打交道。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是，那些竭力宣扬“绝对不受价值论约束的”经济“科学”的人却大肆吹捧政府准则，在装模作样地要为他们的意识形态进行“科学”约束的同时，保卫放任自由，反对平均主义措施。我认为，混乱的根源来自四十多年前莱昂内尔·罗宾斯的一道禁令，这道禁令规定：侵入心理学、政治学说和社会学都是“超出经济学的”，不管所研究的问题可能同这些学科有什么关联；因为传统的工具所决定的是经济学家的习惯，而不是所想研究的问题。^①经济学家们被告诫：要严格坚持资源分配问题在“既定”目标范围之内，不管这些目标对人类福利多么至关重要，都要把它们看作是外加的东西。

萨缪尔斯教授把意识形态说成是“一套概括性的、多少是协调综合的理想、信念和观念，这些理想、信念和观念对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和结构抱着多少是有条理的看法”。注意这种“社会经济”的提法，它是对罗宾斯所规定的界限的挑战。既然公共政策几乎无不包含着意识形态，那末理由大概也就被默认为可以成立。

正是那位“能干而固执的”杰文斯大张旗鼓地提出把人口理论从经济学中分离出来，把“经济科学的列车开上了”资源分配的轨道，而“在这条轨道上”，它又被（独立地）传播以“已知”资源为基础的静态模型的奥地利学派“进一步驱向混乱”。^②使我们得益非浅的是，伊斯特林教授坚持研究了一向不为主流派经济学所重视的那些古典学派所关注的较为古老的问题。能象人口统计因素那样在经济生活中，不论是在增长、生态、环境或是国计民生方面处处

① 参看 L. 罗宾斯：《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伦敦，麦克米伦公司，1935 年版）。这本书仍然值得一读，因为它为许多当代最卓越学者独树一帜的经济学的形成定了调子。

② 引自杰文斯的著作。有关资源分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领域的论述，可参阅杰文斯著作集，第 266—267 页。杰文斯确实对李嘉图进行了猛攻。

沾边的问题显然是不多的；这一点，罗马俱乐部乞灵于沉闷科学（指政治经济学——译者）的马尔萨斯权杖时就一针见血地向我们指出过。

就算资源的有效利用符合人类的目的，数量和质量却是一个高尚文明社会的实质问题：要立论证明这一点似乎简直是堂·吉珂德式的做法。这个问题，古典学派的大师们看得很清楚，因为马尔萨斯那个凄惨的（假设）结论就是要驳斥葛德文和孔多塞特关于在民主时代的曙光使神授君权黯然失色之后出现“完美无缺的新人”的梦想的。

伊斯特林教授对当今关于经济人口统计学的思想作了如下描述：在反馈方面，力量是缓慢的，往往是可以察觉而又模模糊糊，然而通过对人口膨胀的过去历史和未来预兆的研究，大致能决定当今世界的面貌（状况）。

经济学中有不少精致的理论都是从假设技术不变而“工业技艺处于一定水平”为前提的模型中提炼出来的。可是我们所乐于称之为“进步”的东西却多半起因于技术的变革，这就导致了咱们的模型同史实之间有某种极为严重的脱节现象。如果说1876年的美国资源分配是“理想”的，那末美国的生活方式至今还该是1876年式的啰。要是今天的印度按照最理想的设想来分配资源，那末它的境况也就根本不可能好转。创建技术业绩的正是技术本身，不管静态福利经济学施展什么样瞒天过海的伎俩，这终究是平凡而关藏不住的真实。

凯米恩教授和施沃兹教授在一篇我认为是激动人心的论文里强调知识基础的头等重要性的。革新，就象亚当·斯密在关于制针业分工的设想中所论证的那样，都是内源的或诱发的，这跟主张革新是离群索居的发明家提供的外源进步的浪漫说教恰恰相反。有效的经济活动在于力求使资源进而也使偏好具有适应力，而不是信

守静态的消费者主权的原则——即由消费者规定：该做些什么，未来的生产和市场应采取什么路线，以及哪些收入机会的途径应予开放或关闭。

技术在打破过去匮乏的束缚方面究竟能起什么样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这两位教授所得出的结论是乐观的。随着技术超越人类制度对它的控制，最终也许会出现挫折，即：核恐怖，电子窃听，疯狂般的交通运输以及污染的威胁等等。技术就是说研究与开发的灵感——愈多就能救世嘛？让工作变得沉闷单调呢，还是要它生动活泼而富于创造性？

国际经济学不断地产生着卷帙浩繁的文献。互相依赖的现代世界，由于贸易、产量、资本转移和旅游事业的惊人高涨，已经激起了总量飞跃。规模庞大的多国公司使先前的大企业相形见绌。国际经济机构（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贸易谈判，外援，欧洲共同市场等，已使开放经济理论成为经济学教育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就连较为独立的美国经济也不例外。当代世界的力量对比状态、军事联盟以及四通八达的旅游事业已经把孤立主义的帷幕永远掀开。

国际贸易理论通过数学方法业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精确，尽管在模型容纳范围方面不能不有所割爱。两位敏锐的当代问题观察家和实践家——布卢姆菲尔德教授和埃西尔教授通力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对现代理论作了概括论述，并对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进行了研讨，如：汇兑危机爆发问题，国际机构协商应付通常是由于政治原因而引起的持续的经济混乱局面问题。引用了大量的资料来说明在那些实行闭关锁国的国家里，开放经济受到各种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干扰的情形。

经济发展理论主要是在铲除战争后果和建立联合国理想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它同 1911 年问世的熊彼特所撰同名著作中所

表达的思想只有极微弱的联系。

与增长理论相反,其焦点集中在欠发达国家身上(在目前联合国培育起来的国际和睦时代把它们称为“不发达国家”是令人反感的)。增长理论通常总是把企业家在有组织市场上追求利润行为、有文化的劳动力、财产权以及稳定的政治秩序等视为理所当然,就象人类呼吸的空气那样是客观存在的,对革命的动荡则避而不谈。若是在天堂,又有谁去报道天堂的情形呢?然而在欠发达国家,西方经济的那些内在条件并非总是存在的:尽管不合纯粹主义者的口味,我们只有一个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大杂烩。在那些研究富裕的西方经济模型的学者的训练有素的耳朵听来,纲领性的处方总是那么陈腐刺耳——“超经济的”。

有一句叫人胆寒的老生常谈:对欠发达国家来说,“它们贫困的原因就在于它们的贫困”,它们必须不靠注射外援和外资的补针,全凭自力更生来实现本国的兴旺发达。在欠发达国家,即使在高度就业的情况下,储蓄额也是极有限的;而在富裕国家,在投资(照凯恩斯的见解)受约束而就业不足的情况下,人们仍可以挥霍储蓄。当前正被欠发达国家复活的一种古老的策略是,效法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战术,利用组织卡特尔集团来提高向发达国家输出的原料的价格。

杰里·贝尔曼教授根据一种经过整理的学说阐明了早期的乐观主义,并对这种学说从头开始进行了大胆的追溯。这个学说是针对下列相反的观念的:每个国家事实上都各有其可以淹没相似性的特色。这里面包含着对较早的历史学派有关经济学说的看法的重新发掘。这种概述对我们当中具有世界性猎奇心理的人以及对文献只有肤浅了解的人将是大有教益的。

总得有篇文章垫底,于是《激进经济学》就占了本组文章中的这一位置。对专心致志研究市场经济、只注重其潜力而不考虑其

故障的分析提供一个选择,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样安排也许是恰当的。

即便是这样笼统的提法也可能招致激烈的反驳,那就是幼稚地自称:咱们的学科,咱们的经济或咱们的世界,一切良好。现代激进派把从马克思那里借来的大量概念加以现代化,以此为武器争辩说:在财产权、权力和特权被根本改变以前,市场经济是注定要让人类受折磨的。

艾林·阿普尔鲍姆指出,持不同政见者和激进派是一路货,只是在观察者的意识形态眼光中有程度深浅之分罢了。阿普尔鲍姆教授描述了现代激进派的假设基础,共同的政策信条,以及对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经济病态的诊断。

在主流派经济学看来,这篇短论有点异样。一方面,激进派的批判好得很,因为我们存在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不过,难道在社会结构改革之后,人类的命运就从此风平浪静了吗?会有什么新的烦恼来折磨人类呢?

激进派宣称一切社会经济问题的根子在于不完善的制度结构,主流派经济学家则无视激进派的探索,这两种态度都是有害无益的。总有一天,这两派一定会不是发生冲突便是携手联合,把问题闹个水落石出,肃清种种混乱的意识形态臆测。

第一章 福利经济学：或，在什么时候变革就是改善？

摩根·雷诺兹和尤金·斯莫伦斯基

引 言

何谓好的、合理的或中意的？虽然我们一般把这类伦理问题看作是哲学的正式探索目标，但经济学家也一向关心这些问题，也就是探索某种经济制度（或这种制度下的情况）是否比另一种为好。福利经济学是经济学中的一支，它所关心的是伦理标准的发展，根据这些标准我们就可判断什么是合意的，什么是合理的。福利经济学最终取决于个人的价值观念。逻辑和经验的¹知识固然可以发展相应的伦理标准，使人们对什么是合意的这个问题未必就无法达到“理性上的”一致认识，但个人价值观念之真伪却是无法下最后结论的。

一般地说，福利经济学已经认清了初步的否定结论：在决定什么样的结果合意、什么样的结果不合意的问题上，经济学家尚未推导出无可争辩的法则。不过对于这种认识上的不一致倒也不必大惊小怪。要理解这种不一致有一个明摆着的办法，即回到一条公认的经济学基本定义上来：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分配有限的财富以满足人类无限的需要的科学。稀缺——永远无法充分满足一切需求——这一无可避免的事实暗示着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因为人人都表现出渴望多得，势必在人们的所得和所需之间形成紧张局势。在稀缺观念影响下，每个人的行为迥然不同：有的搞谋杀，有的护理病儿，有的则抬高葡萄柚的售价；稀缺观念也为下列情况提供了

一条线索：即为什么任何一套价值观念都不大可能博得普遍的赞同。然而否定的和不一致的结论未必就不如肯定的结论重要。福利经济学使我们在这方面变聪明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是成功的。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对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逐一加以说明。首先，基本结果放在最抽象的研究水平上予以探讨，这有时通称为理论福利经济学。其次则研究关于政府参与市场经济的分配过程问题。最后，对指导政府选择的费用——效益分析方法进行考察。

理论福利经济学

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基本伦理前提是，个人是其自身福利的最佳判断者，或用萨缪尔逊的说法：个人的偏好应予考虑。^①这个假设意味着，某种经济的情况是“好”还是“坏”，不应根据某种外加的伦理标准来判断，而应根据参与者的选择来判断。这种选择有不少在起初是和谐的，但当观念正式形成而它的某些含意变得明朗以后，往往出现对抗。

如果把尊重个人偏好暂定为根本的伦理假设，那就直接引导到福利经济学的最初概念——帕累托的最优化。帕累托最优化的定义是指这样一种经济状态，在这种经济状态下，如果不损及某一个人的利益，就无法（通过对资源或最终产品所可能的再分配）使另一个人的境况有所改善^②。某种经济一旦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状

① 保罗·萨缪尔逊：《经济分析之基础》，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223页。

② 此处仿照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的说法。帕累托虽然很了解个人效用是不能加以比较的，但还是相信关于“集体效用”的定义。参看 V. 帕累托：《政治经济学手册》，1906年，安·施威尔、艾尔弗雷德·佩琪合译本，（纽约：奥古斯都·M. 凯利出版社，1971年）。

态,进一步的再分配势必损害至少是另外一个人的利益。不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经济也被称作低效经济。对于极为简单的交换经济,高效点与低效点之间的差别,可以用埃奇沃思—鲍利方形图加以说明^①。

假设有两个人 A 和 B , 并假定社会固定提供两种消费品 X 和 Y 。 A 方的每条无差别曲线表示各种 X 与 Y 的组合, 这些组合能使 A 得到同样水平的满足; 这些曲线均以西南角的 O_A 为原点, 并按普通方式排列, 即 II_A 优于 I_A , 依此类推。 B 方之原点在东北角, 其无差别曲线是“倒的”, 即 X 与 Y 的择优组合是一步步朝 A 的原点方向推进的。

假如任取一点 D 作为货物之初始分配点, 则 A 拥有 O_AX_A 单位之 X 和 O_AY_A 单位之 Y , B 拥有剩下的 X 和 Y , 即 O_BX_B 单位的 X 和 O_BY_B 单位的 Y 。这种初始状态使 A 居于 II_A , B 居于 I_B 。在 D 点上, A 方的 X 与 Y 边际替代率 (即 TT' 斜率) 相对较高: A 方就乐于牺牲大量的 Y 来获得又一单位的 X 。然而在同一点上, B 方的用 X 换取 Y 的边际替代率相对较低: B 方对增加 X 的单位赋予较低的主观价值, 而对增加 Y 的单位赋予较高的主观价值。这样的货物分配开始呈现“低效”状态。

图1所示形似橄榄球之阴影区, 乃是帕累托认为优于初始状态的两种货物分配的最优情况, 即 A 方 X 多 Y 少, B 方 Y 多 X 少, 至少有一方可在不损害另一方的情况下得到改善。如果 A 方与 B 方各自移动到橄榄球形内新的分配点, 则通过新的无差别曲线的相交——即一个新的橄榄球形——将可确定较小的一组帕累

^① 当代福利经济学虽然与新古典派的交换理论有着深厚的渊源, 它的名称还是取自 A. C. 庇古的著作《福利经济学》, 1920 年第四版 (伦敦: 麦克米伦公司, 1960 年)。参阅 J. B. 希克斯: 《福利经济学的范围和地位》一文, 载《牛津经济论文集》第 27 期 (1975 年 11 月) 第 307—325 页。

托较优点。在双方达到 P_2P_3 线上的任意一点之前，对双方互利的再分配始终是存在的（ P_2P_3 线在以 D 点为初始状态时是包括了一组帕累托最优分配点的）。而在 P_2P_3 线段——埃奇沃思的“合同曲线”——上，则不再存在继续对双方有利的再分配的可能性。在“合同曲线”即连结 O_A 与 O_B 的波状线上，边际替代率对双方都是相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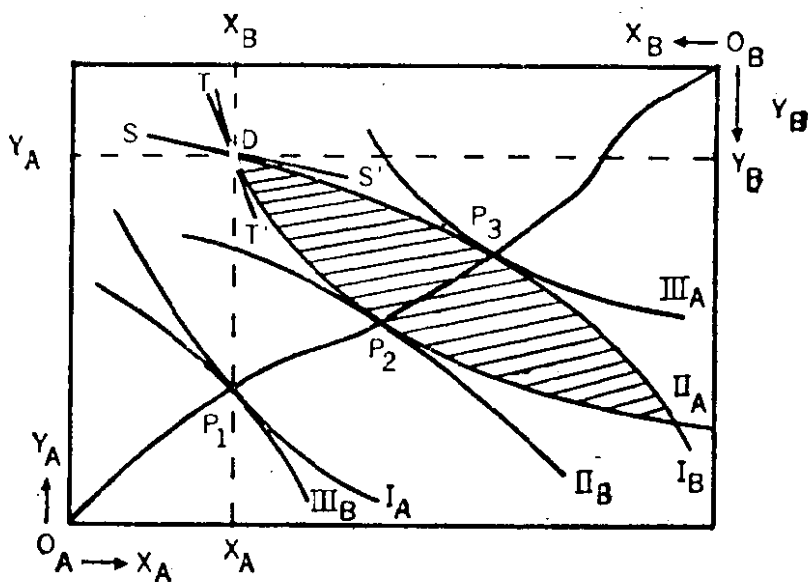


图1 埃奇沃思—鲍利方形图中之高效点

埃奇沃思—鲍利方形(图)解释了货物自愿交换十分普遍的原因，也说明了为什么货物流向那些赋予较高相对价值的人以及交换最终停止的缘故。双方向帕累托最优选择移动的过程一般被描绘成自愿交换，但通向帕累托最优化的机制未必是自愿的。例如，假设有一位无所不知的第三者了解到A方和B方对 X 和 Y 的选择次序，那末从一开始就可以把货物分配得使双方具有相同的替代率，从而免除一切安排自愿交易方面的“手续费”。要对情况了解得这样深入细致当然是不可能的：任何第三者都无法了解别人偏好的全部底细。这就是说，实际上货物的一切初始分配总是

非最优的。①

在研究不同意帕累托最优选择的各种反对论点之前,让我们介绍一下它在生产方面的应用,从而对帕累托最优选择的论点作一个完整的叙述。图一也可以说明追求最大生产量的帕累托最优条件。图上的轴现在分别代表两种固定的(完全无弹性的)生产要素禀赋, I_A , I_B 等则分别是消费品 A 和 B 的生产等量线。②在 D 点上的两种生产要素的初始分配是低效的,也就是说在生产货物 A 时, X 要素用得更多, Y 要素用得少,(而生产货物 B 时则恰好相反),因而两种货物都可以生产得更多一些。图一的橄榄球形区域内之各点则为帕累托较优选择;要是生产者的位置不在合同曲线上,则产出就能增加。只有投入的技术性取代率在所有各种货物的生产中都是相等的时候,才是帕累托的有效生产。

生产以及交换的一般最优化包含着一条简单的法则:每一对(两种)货物——这里所说的货物包括产品及要素——对每个人来说的主观替代率应该等于它们的相应转化率。③假使这种边际相等不能保持,消费者乐于用两个 Y 去交换一个 X ,而生产者可以把 Y 的生产减少两个单位而把 X 的生产增加两个单位。这种情况就是低效的,因为消费者对 X 的评价较高,可是 X 的产量却相对地低于 Y 。

完全竞争经济

于是,帕累托的最优选择必需具备三个边际条

① 见 R. A. 雷德福的经典论文:《战俘营的经济组织》,载《经济学》第12期(1945年11月),第189—201页对在强制环境下交换普遍存在的现象作了描述。

② 每条生产等量线表明两种生产要素在产出等量产品时的各种可能的组合情况。

③ 这种结果可用图解说明,不过画起来极为复杂。进一步的分析见弗朗西斯·贝托:《福利最大化的简易分析法》一文,载《美国经济评论》第47期(1957年3月),第22—59页。

件①，即：一、任何两种货物的边际替代率对于购买它们的任何一对消费者来说必须相同；二、任何一对投入的技术性边际取代率对一切使用它们的生产者来说必须相同；三、货物之间的边际转化率必须等于其边际替代率。在任何经济中，这些条件是实现我们的伦理标准所必须达到的，然而它们究竟是怎样同经济组织的形式发生关系的呢？现代福利经济学已经证实，在完全竞争经济的均衡状态与帕累托最优化条件之间有一种对偶性或对等性。②只要根据下列假设大体上就能证明上述论断：在所有的市场上都存在足够数量的买主和卖主，以免任何一个交易者以自己的影响来操纵物价；一切手续费用和服务费用都等于零；一切家庭都想得到最大效用，而一切厂商则追求最大利润。这些情况综合起来就足以暗示，交换将是帕累托式有效的。消费者在选择任何一组货物时，必然要选边际替代率等于价格比的那一组。由于价格比对所有买主都相同，所以边际替代率对所有消费者也都相同。而要获致最大利润，完全竞争的生产者应按比例使用投入，使技术性边际取

① 确定一般最优选择所必需的条件，其数目部分地取决于说法上的不同。例如，肯尼思·博尔丁在一篇概述福利经济学的文章中列举了七种边际条件，保罗·萨缪尔逊在此以后写道：

关于最佳选择的必要边际条件：在任何两个可变量之间，边际替代率对于一切个人（在主观感觉上）都必须是相等的，同时对于一切选择过程（在技术上）也必须是相等的，亦即共同的技术性取代率和主观价值比应该是相等的；否则，便会存在一种事实上可以达到的、使人人得到改善的情况。

通过引入某些可变投入和可变产出，或不同时期的投入与产出等，这一规则可以扩大成为许多独立的细则。

以上引文见保罗·萨缪尔逊在伯纳德·哈利所著《当代经济学评述》两卷集一书中所作的注释，（霍姆伍德，伊利诺斯州；理查德·欧文公司，1952年），卷二第38页。

② 认为竞争经济有其一定的可取特征，不少较早的经济学家固然早已有此想法，但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才在奥斯卡·兰奇和艾巴·勒纳的著作中有正式的论述。至于精密的发挥，则见之于肯尼思·阿罗的论文《古典福利经济学基本原理之延伸》，该文收入J. 内曼所编的《关于数理统计学与概率的第二次伯克利学术讨论会会议录》，（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51年），第507—532页。随后在阿罗、德勃累等人的著作中也作了种种延伸。